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張九齡集校注

上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

張九齡集校注

中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張九齡集校注

下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ISBN 978-7-101-06135-2



定價：96.00 元（全三冊）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張九齡集校注

上冊

〔唐〕張九齡撰
熊飛校注

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張九齡集校注

中冊

〔唐〕張九齡撰
熊飛校注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張九齡集校注

下冊

〔唐〕張九齡撰
熊飛校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張九齡集校注/(唐)張九齡撰;熊飛校注. - 北京:中華書局,2008.11

(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)

ISBN 978-7-101-06135-2

I. 張… II. ①張…②熊… III. 古典文學-作品綜合集-中國-唐代 IV. I214.2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058752 號

責任編輯:張耕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張九齡集校注

(全三冊)

[唐]張九齡撰

熊飛校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38%印張·6插頁·850千字

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:1-3000冊 定價:96.00元

ISBN 978-7-101-06135-2



序

張九齡是盛唐前期的著名作家，也是繼張說之後主持風雅的文壇盟主，他在唐代文學史上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。但奇怪的是，他的創作似乎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，他的著作既沒有得到完善的整理，研究論著也遠不及盛唐其他名家之多。在熊飛先生的《張九齡集校注》授梓之前，學界還沒有一部張九齡集的全注本。正因為如此，當熊飛先生告知《張九齡集校注》完稿，準備付印時，我有說不出的欣慰。畢竟從最初聽到他談整理《曲江集》的計劃，到如今成書，又是幾年過去了。人生有幾個幾年呢？每個幾年又能做多少事呢？人到中年以後，對此體會得越來越深。

熊飛先生是唐代文史專家，長年從事唐代文史研究，尤其致力於文獻考證，積久功深，多所創獲。這部《張九齡集校注》是他潛心研究、厚積薄發的成果，也是深入研究張九齡的心得結晶。在此之前，他先完成了《張九齡年譜新編》（香港教育出版社，二〇〇五），將張九齡的生平經歷和創作活動作了詳盡的繫年，這項工作為他校注全部張九齡集奠定了基礎，也使他的整理和注釋工作超出現有成果，達到的新的水準。

張九齡集的整理和注釋本目前已有兩種，一是劉斯翰先生校注的《曲江集》（廣東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六），一是李玉宏先生校注的《曲江集》（當代中國出版社，二〇〇四），兩者都不是全注本，只校注

了全集二十卷中的四卷詩。熊飛先生的《張九齡集校注》對全部二十卷作品都作了校注，其難度和工作量首先就超過了前人。當然，熊飛先生的貢獻決不只是這一點，他的校注在使用版本和校勘的完善上更令人矚目。劉、李兩種整理本，對底本并未鄭重推敲，參校的版本和文獻也只寥寥數種，而熊飛先生則是在比勘《曲江集》存世的近二十個善本後，才選擇了《四部叢刊》本二十卷為底本的，這從校勘學的角度說首先就值得稱贊。他除了參校唐代文獻整理必用的《文苑英華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等權威性總集外，還選擇二十卷本和十二卷本中七個有代表性的版本加以對校，擇善而從，同時盡可能地將各本異文保存在校勘記中。這使他的校勘具有總結性的意義，為學界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。

熊飛先生的注釋也較前人有不少進展。他憑藉多年考索唐代文史的積累，盡可能地吸收近二十年新出的成果，更濟之以自己近年治《曲江集》的獨到心得，為張九齡全部詩文做了詳瞻的注解，同時也澄清、糾正了張九齡研究中的一些問題和錯誤，使《張九齡集校注》成為一部體現當代研究水準的完備注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還對張九齡作品進行了補輯。這項工作以前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及溫汝適整理本也做過，但受條件限制，輯錄作品還不够齊全。熊飛先生這次又補輯了《謝公樓》、《遊洞門題陳氏丹臺詩》及《故中散大夫并州孟縣令崔府君夫人源氏墓志銘并序》、《唐贈隴西縣君牛氏像龜碑》等詩文，為研究者提供了新材料。本集所收的一些詔敕類文章，原為節錄，這次熊飛先生也據《冊府元龜》、《唐大詔令集》、《文苑英華》等總集輯出完整的文本，如《籍田赦書》據《文苑英華》補足

大段佚文，《后土赦書》也據《唐大詔令集》補足大段佚文。對溫汝適等人輯自史籍、未注明出處的篇章，都據最佳原始文獻重新過錄，注明出處，同時還刪除了《全唐文》誤收的白居易《敕新羅王金重熙書》一文及四庫館臣誤竄入《曲江集》的《百煞經》等論斷及歌訣十八篇。這一番精細的考訂，保證了《張九齡集校注》的學術價值和學術水準，同時也顯示出熊飛先生嚴謹求實的學風。

我和熊飛先生相識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對唐代詩人戴叔倫的共同興趣將我們聯繫到一起。當時他在咸寧師專學報工作，也留意戴叔倫事迹和作品的考證。我的論文發表後，他來信同我切磋，又撰文對我的作品辨偽和生平考證加以補充，我拜讀他的論文，很佩服他讀書之細和思理的縝密。我給他投了《戴叔倫兩居江西辨證》一稿，刊登於《咸寧師專學報》一一卷二期（一九九一）。從此以後，我們既是作者與編輯，又是切磋學問的同道和朋友。雖天各一方，難得晤面，但始終保持聯繫，我從心底一直視他為兄長和諍友。

二〇〇〇年，熊飛先生移席韶關大學，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，我很為他高興。後承他惠寄新著《張九齡年譜新編》，知道他因執教於張九齡故鄉而發願整理張九齡全集，又暗自為他叫好。張九齡不僅是韶關人的驕傲，也是廣東的文學始祖。清代詩論家溯源廣東的詩歌傳統，總是奉張曲江為開宗始祖。翁方綱《石洲詩話》卷一云：「明順德薛岡生序南海陳喬生詩，謂粵中自孫典籍以降，代有哲匠，未改曲江流風，庶幾才術化為性情，無愧作者。然有明一代，嶺南作者雖衆，而性情才氣，自成一格，謂其仰企曲江則可，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也。曲江在唐初，渾然復古，不得以方隅論。」

又云：「曲江公委婉深秀，遠出燕、許諸公之上，阮、陳而後，實推一人，不得以初唐論。」他一方面肯定張九齡作爲嶺南詩歌初祖的地位，同時更強調了張九齡作爲初盛唐之交文壇盟主的超地域、超時代意義。身爲韶關當地的學者，整理張九齡詩文集，表彰張九齡的文學業績，自是義不容辭的職責。翁方綱曾遺憾地提到「近時粵中所刻曲江公集，頗未精校」，現在有了熊飛先生的校注，足以告慰覃溪於九泉。

熊飛先生以書稿殺青，行將上梓，馳書囑我寫個序言。回想當年往來論學之樂，計仰交於先生忽已二十年，披覽先生新著，欣抃之情不啻如自己的筆墨，因略述作者平素用功之勤及成書體例之善，以告讀者，并志二十年交誼云爾。金陵生蔣寅謹撰，二〇〇七年清和之月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。

前言

對開元名相張九齡有所注意，始於申報「唐代文化名人研究」這個課題。但當時限於學力，一直遲遲不敢動念。從湖北來到廣東，一下把我與張九齡及其《曲江集》拉近了許多，我知道張九齡為嶺南一人，其政治文化地位少有可比；又見其籍貫有范陽、始興、曲江之爭，且其《曲江集》一直沒有一個完整的整理本。於是便不揣淺陋，立意研究張九齡及其《曲江集》。數易寒暑，一仍其舊，至今已是八載。八載在人生的長河中不可謂長，但也不可謂短，這兩千多個日夜，我多數時間都埋頭於《曲江集》中，現在終於可以做個總結了，心情是難以形容的。

關於張九齡的籍貫之爭，我從文化角度，最終找到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。他的郡望為范陽，唐人喜歡以郡望相稱，故張九齡自稱或他人稱之為「范陽張九齡」就不足為奇了。他的祖籍為始興縣，宋祝穆《方輿勝覽》卷三七言：

張九齡，祖居始興縣，今墳墓宅基皆在焉。本傳謂韶州曲江人，蓋雄州未建之前均隸曲江，既又析曲江為雄州，則九齡乃雄州始興縣人也。今子孫盡在南雄。

祝穆只知張九齡「祖居始興縣，今墳墓宅基皆在焉」這個事實，但却不知古政區變化的依據。這裏解釋說始興「雄州未建之前均隸曲江，既又析曲江爲雄州，則九齡乃雄州始興縣人也」，這個說法却是錯誤的。始興并非從曲江析出，而是從韶州析出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實際上，張家晉末從范陽南遷「江表」，所遷之地爲豫章郡，後又從豫章郡分出廬陵郡，從廬陵郡分出廬陵南部，再由廬陵南部改名南康郡（《晉書·地理志》）。始興縣是從南康郡分出，而非如祝穆的想當然。這有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的記載爲據：「始興，漢南野縣地，屬豫章郡。孫皓分南康郡之南鄉，始興置縣。縣界東嶠，一名大庾嶺。」

始興是張家祖籍，《新表》稱張九齡爲「始興張氏」，張九齡封爵兩封始興，就很可能說明問題。但他的籍貫却是曲江，其四代祖張君政作韶州別駕之時，就把家安在韶州曲江縣，他家自然應該籍隸曲江。其封爵首封曲江縣，正寓「歸本」之意。

張九齡爲晉張華第十五代孫，先祖世居范陽方城，後遷居「江表」，籍屬南康。其弟封爵兩封均爲南康，這也說明南康爲張家「本」之所出是不爭的事實。南康爲楚之南疆，始興從南康分出，「縣界東嶠」，又入嶺南之限。從張九齡祖上籍貫的變遷情況看，張九齡「嶺南一人」的出現并非偶然，應是中原文化同楚文化與嶺南文化交匯的結果。

張九齡（六七八—七四〇），一名博物，字子壽。少聰敏，七歲知屬文。年十三，廣州刺史王方慶見其文，贊曰：「此子必能致遠！」武后神功元年（六九七），鄉試中試，得試進士資格。長安二年（七

○二，入京參加進士試，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，一舉高第。長安三年（七〇三），張說流嶺南，一見九齡文章，便「厚爲禮敬」。中宗神龍三年（七〇七），九齡恰逢而立，中「材堪經邦科」，解褐秘書省校書郎。玄宗即位，九齡以「道侔伊呂科」對策高第，遷左拾遺內供奉。十年之間，九齡連登三策，立志「致君堯舜，齊衡管樂」（徐浩《始興開國伯文獻張公碑銘》，以下簡稱《徐碑》）。時姚崇爲相，九齡不避利害，上書勸其「遠諂躁，進純厚」（《上姚令公書》）；又上封事，直言指陳地方吏治弊端，由此「不協時宰」，「辭病拂衣告歸」。

開元四年（七一六），張九齡返歸曲江奉養老母。他見當地交通阻塞，便獻狀朝廷，爲開鑿大庾嶺新路出謀畫策，朝廷便委他躬督斯役。由於開鑿有方，大庾新路不久告竣。大庾嶺新路的開鑿，對促進南北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貢獻。

開元六年（七一八）春，九齡遷左補闕，奉詔返京。八年，遷司勳員外郎。在任左補闕及員外郎期間，吏部試選人及應舉者，每令右拾遺趙冬曦與九齡考其等第，前後數次，都詳正公允（《舊唐書·張九齡傳》）。開元十年（七二二），張說爲相，對九齡親信有加，擢爲中書舍人、內供奉，封曲江縣男。開元十三年（七二五），玄宗東封泰山，張說趁封禪之機爲親信加官晉爵，九齡力諫不聽，後果遭非議。次年，張說被劾罷相，九齡也因此改任太常少卿。尋出爲冀州刺史，未至任，表請換江南一州，以便奉母盡孝。玄宗命以原職祭南岳、南海。北返，優詔許授洪州都督。開元十八年（七三〇），轉桂州都督，兼嶺南道按察使。他在任黜免貪官，提拔賢士，親理刑獄，明察善斷，使洪、桂二州「澤被膏雨，令